

共生与同化

唐人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吴景超 著 筑生 译 郁林 校

共生与同化

D6343712/5

78226

唐人街

吴景超 著 筑生 译 郁林 校

● 天津人民出版社

此书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所保存吴景超先生1928年8月的博士论文翻译而成

唐人街：共生与同化

吴景超 著

筑生译 郁林校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山东肥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125印张 2插页 246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

ISBN7-201-00516-2/C·57

定价：5.90元

DH26/14

目 录

代序 (1)	(1)
代序 (2)	(5)
第一章 中国人发现美洲	(8)
第二章 旧线织新网	(24)
第三章 有色眼镜下的华人	(42)
第四章 经济危机和种族冲突	(59)
第五章 寻求安身立命之地	(83)
第六章 移民转入地下	(94)
第七章 移民偷越国境	(117)
第八章 唐人街	(138)
第九章 唐人街的生活组织	(155)
第十章 帮会及帮会活动	(178)
第十一章 帮会斗争	(198)
第十二章 华人家族和家庭生活	(219)
第十三章 家庭中的文化冲突	(239)
第十四章 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同化问题	(257)
第十五章 异族通婚	(274)
第十六章 边缘人	(308)
第十七章 从世界范围看华人迁移	(324)
附录 为求民富国强贡献一生	(346)
译后记	(351)

代 序 (1)

——在纪念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教授 学术思想讨论会上的讲话

费 孝 通

就我所知，吴景超先生是我国第一辈的社会学家。1934年我进清华大学研究院的时候，吴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听过他的课，是他的正牌的学生。其实在我进清华之前，我们就认识了，我们经常有来往。今天是学术讨论会，所以吴先生的为人，他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我们且不去谈论。从学术上讲，吴先生的治学精神是非常认真的。他读了书之后，就要做笔记、作卡片。他的卡片有许多箱，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当时我们要什么资料都会去找他。我要查历史知识找潘光旦先生，要查各国情况、社会统计就找吴先生。这种治学精神，我们这一代很少人能真正继承下来。

一个学科的发展要跟着社会的发展走。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当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评论当时的学术成就。吴先生是走在学科前面的人。他在学术上的一个特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他从实际的社会生活、社会现象中去发现问题，而从当时能找到的资料综合起来，对于这问题发表意见。同时针对地提出了办法。当然，这办法你可以不同意，但在当时

的历史条件下，他对中国的发展能提出这么多的主张，他是占风气之先。这不是加一个什么主义能抹杀的。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我想谈谈我从他那里学到些什么？我与他有些什么不同？学术上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吴先生和我们上一代的社会学者都坚持了这条原则。我们大家可以发挥不同的学术见解。我们学生可以从不同的老师身上学到东西。吴先生和潘光旦先生是好朋友，但他们学术上可以相差很大。陈达先生又是一个样子。各有特点。这真正是一个百花园。大家相互帮助，相互尊重，而从来没有相互排斥、相互扯皮过。所以，这种风气值得我们后一辈人学习，特别是最近的一辈。因为有这么一段历史，造成了一种排斥百家争鸣的风气。

我从吴先生那里学到了东西，而不是完全照他那样做的。最大的区别是，他的研究是宏观的，用全世界各国的材料来做比较，去找中国社会的出路，去理解中国社会。我没有走他的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我走的路子，表面上讲是一条相反的路子。我是微观的，从中国内部实际情况去理解中国社会。可是，我就缺乏比较材料。我对世界其他各国的情况，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经过不熟悉。各国的发展、各种不同社会的发展情况我也不熟悉。我所熟悉的是从早期原始社会开始的。我常是从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所看到的各种现象出发探索。在这一比较之下，我们两人的看法，可以有不同的结论。宏观与微观应当是互相补充的，它们可以错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的，但做学问的人很难一个人兼顾全面。从这个出发点，我从吴先生的学术里看到他的成就，同时也看到形势的变化，看到他不能达到的地方，而采取了一个新的办法去进行研究。

吴先生很欣赏我的作品，这是真话。他看了《生育制度》后说：“这真是一本好书！”第一个评论我的《生育制度》的就是吴景超先生。后来我写了《禄村农田》，又得到他的肯定、支持和欣赏。我们互相欣赏，他的“第四种国家”，我对他的这种分类，就是到现在还在用，这就是工农比例。现在讲小城镇，讲中国农村的发展，最后总要有一个比较，有个基础，就是工农比例。如苏北是三七开，到了扬州是五五开，过了长江是倒三七开。这样才能表示得清楚。实际上这个方法是我从他那里学来的。

其次，我们对于整个世界的各国社会要有一个基本的分类，不要一刀切，只有比较，才能出结论。所以我现在还使用这个方法，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耿车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等等。各有各的特点。总之，我过去听了他的课，看了他的书，在我思想上潜移默化，在我思想里生了根，等到我再进行研究时，这些就起了作用。

我现在感到我的不足，就是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了解不多。特别是我们目前正处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假如对世界的经济的总的情况，宏观的认识不够，就很难真正抓住当前中国改革的出路。一方面要了解到我们原来的底子是什么，另一方面要了解到世界情况是什么，在这里边才能真的找到一条发展中国经济、生产力的道路。最近提出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我就更觉得自己这方面的不够了。

过去很早就有人要我去深圳。我没有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对于国际金融不懂。我没有时间，我快八十岁了，没有时间去补这个课。如果对币制、金融、进出口、外贸这些方面没有知识，就不能了解这个地区发展的根本条件。但是现在躲不

了。不仅是一个特区，而整个沿海都成了特区了。所以，我上次到香港找潘光旦先生的弟弟，潘光迥先生，他是学经济管理的。他帮助我们国家培训了许多企业家。他后天将开始在上海开一个班，叫做“上海经济区外向型企业管理学习班”，是汪道涵同志主持的。我自己报名，做学生。我要去学一学，补一点课。

吴先生在当时的条件之下，放眼世界，看到世界中的中国的地位。我一下子钻到土里面去，到乡土中国里面去，所以，尽管我现在七十八岁了，我还得要从土里钻出来。乡下人要上街、要进城。我的头脑要从乡土中国进入一个现代化的中国。

我们的研究工作、我们的知识分子应当走在人家的前面，而现在我们的研究工作、我们的知识分子反而落在农民的后面。农民中出了这么多的企业家，是从实践中出来的。我们还没有跟上去。假如我们不能跟上去，反而拖他们的后腿，那么我们就会变成历史的罪人。所以，我尽管年近八十，我觉得还应当补课。这就是说要同吴先生的学术思想结合起来，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乡土同当代国际相结合，这样逐步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学的一批概念。这些概念应当是从本土来的，如亦工亦农、乡村工业。这在吴先生的时代还没有。他说的工业化是都市工业化。我们却出了一个农村工业化，可是并不是说排斥都市的工业，并不是不要都市，中国都市应当是怎么样，现在还需要有人去研究。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所以，我们只有学习老一辈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精神，用我们的社会学知识，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88年5月14日

代 序 (2)

——在纪念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教授 学术思想讨论会上的讲话

雷洁琼

我和吴景超先生是同行，常常有来往。我很佩服吴先生的治学精神，所以有什么问题，就常常向他请教。他的《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出版以后，我读时，对他的前三篇非常佩服，觉得他确实是针对我国的问题来提出解决的办法。但对于最后那一段，有关社会主义的，我就去请教他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他在书中写道：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实现的可能，没有实现的必然性。我去请教他这个问题，经过互相讨论，我也没有完全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当时学习了一点社会发展史的理论，认为经过资本主义就必然进入社会主义，是必然性的规律。但是从讨论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实际问题的知识。另一个问题是，他这本书的第二个观点，即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消灭是不可能的，阶级是不可能消灭的。但我当时认为阶级问题是分辨社会发展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社会主义不能消灭阶级，那么同资本主义怎么分别呢？当时我就怀疑，还没有解决我的问题。但是我同他讨论这个问题时，确实长了很多的知识。最后一个问题是，他书中说，各取所需是一种乌

托邦，永远不能够实现的。同吴先生讨论这些问题，启发我思考，我受益很多。因为他当时对中国的情况、对各国的情况了解得很多，他引了许多材料来证实他的主张。但是，在我心目中这三个问题一直带到解放以后。目前来讲，我们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资本主义。所以我觉得很好地来研究吴教授的学术思想是很有意义的。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有事实根据的，不是一般的说法。我们现在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最近我看了吴大琨同志的一篇文章，给我启发很大。同时，我们也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我认为吴先生的著作对于我们现在结合目前形势来研究这两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这是关于他的学术问题。他对于发展城市工业、救济农村、人口问题、节制生育等等问题，在当时确实是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解决的办法。

吴景超先生是一个爱国主义的学者。在解放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他劝胡适不要走。应学生的邀请，我同他一起在燕京大学做报告，要我们谈谈对时局的看法。我记得他在那篇演讲里说，日本要来占领北京的时候，我必须走，因为这是外国侵略我们，现在共产党来了，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无论怎么样，我何必要离开清华呢！我绝对不走！他讲了很多道理，对于我们的同学，对于清华、燕京的同学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吴景超先生是我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我们的老社会学家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要使社会学中国化。虽然我们大多数，可以说全部都是英美留学生，但是每一个老前辈，无论陈达同志、潘光旦、吴景超同志等，都努力研究中国社会情况，使社会学中国化，不是照抄欧美的理论。所谓中国化，就是要使社会学为国家服务。研究我们中国的问题，不是去研究外国的问题，

这是我们老一辈的很大的特点。因此,老一辈发表的文章,都是讨论国内的问题,提出他们的建议。当然,我们的老一辈(包括我在内)没有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教授社会学,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情况。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根本上不了讲台。

研究我们国家的问题,从实践中提出他们解决的办法。老一辈科学家所做的工作,可以说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老一辈留下来的遗产,包括吴景超同志的遗产,值得我们大家、后一辈学习。

1988年5月14日

第一章 中国人发现美洲

美洲，未知的世界

美洲何时被发现？教科书告诉我们是1492年。不管怎么说，这是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年份。但是印第安人发现美洲比哥伦布早得多。中国人发现美洲却比哥伦布晚了许多年。当英国人和其它国家的人们正忙于在北美东海岸殖民时，中国人，或者说至少大多数中国人对这块新大陆却一无所知。中国沿海商人和冒险家们，当他们与其它国家的商人做交易时，确实模模糊糊地听说过“生活在某些遥远岛屿上的野蛮人”，但是在我们看来，他们这方面的知识既朦胧又不准确，很难深入内部，并为众多的中国老百姓所掌握。中国人绝大多数生活在小的村落里，出门通常不超过邻近的城镇，特别是他们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地图。而没有地图的帮助，谁能相信世界上还有别的国家存在呢？结果是，美洲，象许多欧洲国家一样，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都是一个未知世界。

来到中国的第一艘美国商船

当中华帝国其它地方的士大夫们连篇累牍，阐发中国是天

下最伟大的和唯一的文明古国的宏论时，广东人最先瞥见了西方人。1518年葡萄牙人派遣一位使节来到中国，试图通过谈判，安排两国之间的商业往来。当他的船只到达广东时，“当地人的大大小小的船只都围了上来，以便先睹为快，看看这一奇特的景象”。^①从那时起，广州开始在贸易方面对外国人开放。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的船只也纷纷来到广州，但是美国的第一艘商船却迟至1784年才来到这里。美国船？这不过是另一种洋鬼子罢了。中国商人对这条来自美国港口波士顿的船只并不感到有什么兴趣。这条船上负责管理货物的塞缪尔·肖少校费了好大气力，才使中国人相信美国的存在。

1. “我们的船是首航中国的美国船。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才使中国人完全明白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区别。他们称我们是来自新国度的人。当我们借助地图，向他们介绍了我国的规模、现状和日益增加的人口时，他们对美国有可能成为中华帝国产品可观的市场的前景，感到相当高兴。”^②

三角贸易

在这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美贸易使美国大西洋沿岸的商人们发了财；又经过一段更长的时期，中美贸易对加利福尼亚的历史进程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肖的成功冒险之后不久，波士顿的商人们野心勃勃，想出了一个包括西北海岸在内的新英格兰——中国贸易计划，这一计划是：新英格兰的商人们购进棉花、念珠、小刀、毛毯等等，与西北沿太平洋岸的印第安

① J. Abbott: *China and the English*, p. 60.

② J. Quincy: *The Journals of Major Samuel Shaw*, p.

183为便于参考起见，本文所引文献按顺序编号。

人交换皮革和毛皮，然后运往广东销售。一次航行，一个商人可收集到六千张皮革，半天功夫就可换到560张，代价只不过是 用一个半美元从波士顿买来的各种小商品。这种皮革运到广州市场，一张就值四十美元，然后倒换成茶叶和丝绸。这种买卖，两、三年一个航程，就可大发其财，赚到比本钱多二到四倍的利润。^①

来自新国度的人，还是新洋鬼子？

随着这种贸易的进展，广东商人和外贸官员对美国情况的了解逐渐增多。那时，中国人对西方世界并不是很感兴趣，只有商人希望了解太平洋彼岸的一些情况，因为他们得到的毛皮是从那里来的。在农民和劳动者看来，“新国度的人”和早先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没有多大区别，都不过是洋鬼子罢了。从文献2可以看出北欧人在中国农民心目中的形象：

2. “我常到父母那里去吃饭。我对爷爷诚惶诚恐，对父母毕恭毕敬，对兄长也很尊重。我总是一言不发，除非他们同我说话。但是我洗耳恭听，听到许多关于红头发、绿眼睛、满脸是毛的洋鬼子的事。他们最近从海里钻出来，成群爬上我们的海岸。他们野蛮、凶猛、邪恶，丝毫不懂孔夫子和其它先哲的教诲，也不尊重他们的祖先，还自作聪明，以为比他们的父辈、祖辈高明。他们好打人、抢劫、谋财害命。在香港街头，可以看到许多他们那样的醉鬼，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说话象野人嚎叫，那声音就象老虎或水牛的吼声一样。他们想要抢走中国的土地。他们男男女女象禽兽一样杂居，没有婚配，不讲贞

^① 参看 R. G. Cleland: A History of California, Ch. I,

操，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恬不知耻地手挽手地逛大街。老农民滔滔不绝地讲述着。”^①

传教士W. H. 梅德赫斯特在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之前十三年来到中国。如果他那时了解中国农民对外国人的态度，也许就不会发出以下的抱怨了：

3. “遭到侮辱，这是在广州居住的外国人不得不忍受的另一种不幸。他们随心所欲地把一切不属于中国文明的外国人称作‘野蛮人’，此外，他们还经常使用一个更使人难堪的形容词。当你在广州市郊或珠江沿岸行走时，‘洋鬼子’的叫骂声会从四面八方传入你的耳鼓，甚至还可以看到母亲教她们的婴儿指着我们这些外国人学着叫骂；有的甚至绕道走过来或放下工作，跟着嘲笑取乐，以满足他们喜欢骂人的癖性。连政府衙门也不怕有失身份，采取辱骂欧洲人的鄙劣行径。直到最近，海关监督在官方文件里还把横帆船称作‘鬼子船’。

“懂得这种侮辱性言词的欧洲人更加感觉刺痛，这需要有相当的克制能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佯装不知，一走了事。有人说，广州人长期以来一直把外国人称作‘鬼子’，以至于他们这样做时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尽管这一借口经常为污秽的辱骂作辩解，但是这种辩解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中国人用‘鬼子’一词时，往往是有意加重语气，并似乎感到津津有味，明显表露他们是有意惹人不快。他们甚至还故意发出吱吱喳喳的声音，模仿所谓的鬼叫，有时还更换辱骂的词，因此他们的真实意图是无容置疑的。”^②

^① Lee Chew: "The Biography of a Chinaman," Independent, 55 (1903), p. 419.

^② W. H.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p. 223.

默默无闻的“哥伦布”们

尽管中国人总是以怀疑、害怕和难看的脸色对待外国人，但还是有人为冒险心理和发财愿望的引诱，远在旧金山出现居民村落之前，就设法来到了美国。第一批华人何时到达美国，众说纷纭，难以确定。查普曼坚持认为中国人先于西班牙人和英国人来到美国，^①班克罗夫特则认为晚得多。他说中国人作为劳工受雇于下加州造船厂是在1571年到1746年。^②更多的人倾向于中国工人是在1788年5月才开始来到太平洋沿岸。^③中国人是否象这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早就来到美国，是值得讨论的。但是我们说1820年有一个中国人来到美国，这是确凿可靠的，因为这一事实有美国移民局的记载作证。到底什么原因使中国人来到美国和怎样来到，至今不得而知。据移民局记载，1820—1848年之间，至少有40名中国人来到美国，可能其中有一位名叫波士顿·杰克，奥斯蒙德·蒂法尼1844年曾在广州遇见过他。

4. “我们的同胞把我们介绍给一位当地人，所有美国人都知道他叫波士顿·杰克。他早就到了波士顿，讲一口流利英语，他似乎以广州‘黄埔’使者自居”。^④

移民局关于早年东方移民的数字不太可靠。他们说，1850

① C. E. Chapman, A History of California, The Spanish Period, p. 8.

② H. H. Bancroft, History of California, Vol. VII, 335.

③ E. S. Meany,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Washington, p. 62.

④ O. Tiffany, The Canton Chinese, p. 21.

年前只有46名华人进入美国。^①但据人口普查资料，1850年华人已达758人，其中660人在加利福尼亚，^②这些数字更接近于加州历史学家H. H. 班克罗夫特的说法：

“第一批来到现在加州的华人有两男一女，他们是乘鹰号快船于1848年到达的。男的当了矿工，女的在查尔斯·V·吉莱斯皮家当佣人，这家人是从香港迁来的。1849年2月，加州的华人男人增加到54人；1850年1月，华人男人增加到787名，妇女增至两名；1852年1月共有男人7512名、妇女8名。同年5月则总共增到11787名，其中妇女7名。”^③

黄金的引诱

1848年后，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移民突然象潮水般地涌来美国？原因就是在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黄金也同样吸引了其它国家的人流登上太平洋彼岸。

“1848年3月中旬，旧金山的居民增加到812人，面对优良的港口和内地丰腴的土地，本来很有希望成为一个商业重镇。但是这种宁静的、四平八稳的经商很快就被搅乱了。这一年的春天，内华达山脉的山麓地带发现了大量黄金矿藏，有几包金矿被带到旧金山，同时，一些访问过这一矿山的人和挖矿工人也来到这里，金矿地区遍地黄金的消息就这样传开了。

“以后不久，这个国家的居民，或单枪匹马，或成群结队迁居到这块据说地下蕴藏着无数财富的土地上来。劳动的代价

① J. J. Davis: "A Century of Immigration," Monthly Labor Review, 18 (1924), p. 8. 表。

② Census of 1850. xxxvi.

③ H. H. Bancroft: 前引书, p. 336.